

Art and Craft of Translation

英汉 口笔译技艺

Art and Craft of Translation

何刚强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英汉口笔 技艺

何刚强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口笔译技艺/何刚强编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309-03689-1

I. 英… II. 何… III. 英语-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102 号

英汉口笔译技艺

何刚强 编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计美娟

装帧设计 陈萍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88 千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 000

书号 ISBN 7-309-03689-1/H·736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在西方,翻译及翻译研究在历史上似乎长期被看成只是文学或比较文学领域里的事,是纯文人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语言学(特别是结构语言学)的发展,对翻译的研究逐渐被纳入所谓的应用语言学的范畴(不幸的是,直到今天,我们的翻译(专业)学科还是按此划分的)。20世纪50年代,人们出于对机器翻译的美好憧憬,又把翻译研究纳入了完全是刚性的科学技术范围。但后来人们发现科学技术很难使翻译就范。因为翻译就其本质而论,更属于形象思维,与艺术更有共同(共通)之处。

20世纪70年代前后,由于以James S. Holmes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者的开创性工作,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科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翻译研究的地平线一下子宽广了起来,翻译研究项目、翻译院系、翻译培训等都得到了迅猛发展,翻译论著和刊物迭出,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一门学科确立了起来,其图书编目也已自成体系。至此翻译研究令人刮目相看了。

20世纪90年代始,翻译研究的发展又出现一个所谓的“文化转折”(a cultural turn)。这一转折意味着翻译研究的内涵和视野又被进一步拓宽,翻译研究与文化(比较文化)密不可分,由此导出翻译研究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态势,出现了学派纷呈的空前繁荣局面。在西方,翻译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

西方翻译研究的重大进展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一直产生着积极的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这种影响似乎更加明显。跟踪、介绍、研究西方翻译的文著大量出现,由此引起了对我国翻译研究(包括翻译教学研究)现状一系列的思考、讨论、争论,其热烈与激烈的程度也是空前的。

以何种态度来对待西方翻译研究的成果,是我们每位从事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工作的人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做到以下三条。

第一,要深入了解、认真研读西方翻译研究界的代表作,特别是近 20 年来的著作,争取从第一手资料中知晓这些代表作的主旨。应当承认,西方翻译研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insights)值得我们汲取,而直接接触原著原文就更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些真知灼见,避免盲目人云亦云。

第二,对西方庞杂的翻译研究应作必要的分析与取舍。西方人的研究是从他们的语言文化条件出发来考虑、考察问题的。有些东西不一定对我们有大价值。择善而从是我们的原则。那种“言必称希腊”的态度恐怕不利于我们的翻译研究健康地发展。

第三,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创造性地从事翻译研究。只有具备民族特色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真正让世界共享的东西。中国翻译研究的传统应在新的开放时代得到继承、发展,而不是被否定与完全抛弃。就翻译研究而言,至少在我国的现阶段,应该是多数人都去面对现实,去做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去解决翻译实践中大量的矛盾与问题。笔者以为这是我国现阶段翻译与翻译研究的主要方向,也就是要直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使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当然也应少量的人去从事抽象的、与翻译实践相隔很远,甚至无甚关系的各种形式化研究,就如同金圣华先生所说的,不善飞翔的人照样可以“研究飞翔,观察飞翔,讨论飞翔的可能性,飞翔和流体力学的关系等”^①,并写出专门的文著来。但是如果多数人都争相去做远离翻译实际的工作,或只是纸上谈兵,那么翻译研究的生命力恐怕就会走向衰败。

① 金圣华、黄国彬主编《因难见巧》,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第 11 页)。

从技术层面上讲,我们完全可以将翻译与翻译研究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确实是两码事。问题是搞翻译研究的人要不要具备相当的翻译经验?这在过去并不是问题,因为当时国内对翻译研究有建树者大多是作家(诗人)兼译者。但现在这个问题成了一件有争议的事。《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教授曾经说,若无100万字的翻译经验者,免谈翻译研究。这就是强调翻译实践感知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没有体会过翻译笔耕酸甜苦辣者,不具备谈论翻译的发言权。

本书所讨论的英汉口笔译的技艺,注重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全书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认识翻译”,主要从理论上对翻译的本质、翻译与文化、翻译的创造性等问题进行讨论。学习翻译的人应当概要知晓这些问题。这部分内容应被看作是对翻译问题宏观上的策略铺垫,其中借鉴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不少新见解。诚然,就翻译的宏观理论和策略而言,还有不少其他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但考虑到本书主要内容是具体的翻译策略讨论,第一部分的内容不宜过多,所以只能精选四个小题目。

第二部分“笔译技艺”是本书主干内容,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英汉翻译(也涉及汉英翻译)的技巧问题。这部分共分七节,其中有三节内容(“关于英译汉的推敲问题”,“英译汉六法”与“汉译英的增删与重组”)笔者在前些年曾经发表过,这次对它们进行了必要的修改。

第三部分“口译研究”虽然所占篇幅最少,但是十分重要。我国高校外语院系(英语专业)从传统上讲都重笔译而轻口译。如何使英汉口译在翻译课中占有应有的位置,以适应国家对口译人才的需求,至今恐怕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好的问题。笔者在过去几年里,尝试在英语专业四年级的英汉互译课程中补充相当的口译训练内容,收到了一定成效。

第四部分主要是为英汉互译课程的学生提供笔译和口译训练

的素材。后附的参考译文确实只供参考而已。学生若熟练驾驭英汉两种语言,又勤于思索,善于推敲,译文的质量一定会超过参考译文。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讨论的翻译技巧以英译汉为主,兼顾汉译英问题。

近 10 年来,国内英汉(汉英)翻译教材的出版呈现“春秋战国”局面。这些教材都自成体系,但很难为语言与翻译专业通用。理想的情形应该是:教翻译的人自己应是善译者,且对翻译理论有较好的把握。这样他自己选材,教来也得心应手。实践证明,编写一本翻译教材,让学生固定不变地去用,效果不一定好。因为,教师的口味有不同,学生的起点也各异。但是编写一本翻译参考教材是可行的。它不求体系之全,只是在精述理论的前提下,对翻译的一些重要技巧问题进行较具体的讨论。《英汉口笔译技艺》的目的即在此。本书为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四年级英汉互译课程与研究生翻译研究课程的必备书。它同时也可作为一本翻译学习的自学教材或参考书,对广大想要切实提高自己英语中高级口笔译能力的学生也有直接的参考价值。诚恳期盼本书的使用者能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书中全部英文例句和篇章都摘自当代英美报刊和书籍;口译讨论与实践的部分英语材料取自联合国网站。

本书虽杀青于 2001 年暑假,但其主要内容的腹稿却是在 2000 年春构思的。那时笔者正在夏威夷大学当访问教授,受到良好的接待。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安乐哲先生(Prof. Roger Aimes)和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教育部主任伊丽莎白·巴克博士(Dr. Elizabeth Buck)为我当时在那里的翻译研究工作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和良好的条件,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要对这两位美国朋友深表谢忱。

何刚强

2003 年 5 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分 认识翻译	1
一、从对翻译(者)的比喻看翻译的本质	1
二、翻译与文化	11
三、翻译的责任与创意	21
四、机器翻译:长处与局限	31
第二部分 笔译技艺	40
一、英译汉的文字推敲	40
二、英译汉六法	48
三、英译汉中语义的变通与阐释	96
四、文字与文采	105
五、英汉词语对应漫谈(一)	118
六、英汉词语对应漫谈(二)	123
七、汉译英过程中的增删或重组	130
第三部分 口译研究	141
一、口译的主要种类及其相互关系	141
二、口译与笔译的关系	142
三、口译与笔译的区别	143
四、英汉口译(视译)策略	144
五、汉英口译(视译)策略	158
第四部分 实践翻译	163
一、英汉笔译	163
二、汉英笔译	174

2 英汉口笔译技艺

三、英汉口译(视译)	177
四、汉英口译(视译)	188
五、参考译文	193
部分参考书目	226

第一部分 认识翻译

一、从对翻译(者)的比喻看翻译的本质

人类自有语言交流以来,翻译活动也就一直相伴相随。翻译不仅使得人类各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而且还帮助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文明的更高阶段发展。翻译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都是不言而喻的。人类对翻译的认识被记载在历史和当代的许多有关论著里,其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学者和翻译家对翻译或者翻译者作的比喻^①。在翻译活动风起云涌、翻译的理论研究日益兴盛的今天,我们对这些比喻作点探讨也许对加深翻译本质的认识是极为有益的,对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准也不无启发意义。

我们在阅读有关翻译论述的著作或文章时,对翻译和翻译家的种种比喻称呼就会经常跳入眼帘:普希金曾把翻译家比喻成“人类精神的传递者”^②。歌德把文学翻译称之为“世界上全部交际来往中最重要、最高贵的事业之一”^③。I. A. Richard 把翻译称作为“整个宇宙中最为复杂的活动之一”^④。美国的一位翻译家说“翻

① 本文引用对翻译的比喻基本都源自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我国学者,如钱钟书、傅雷等学者以及一些翻译家,对翻译也都有自己的比喻。这些比喻在国内译学界早就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② 见 Wechsler 1998. p. 9.

③ 同上。

④ 见 Holmes 1988. p. 104.

译更像是把灵魂从一个人的身上取下来置入另一个人身上去”^①。爱尔兰著名翻译家 Gabriel Rosenstock 更把翻译的艺术比喻成在朋友之间的输血^②。《圣经》翻译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1611 年问世欧洲,在西方宗教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圣经》的翻译者在事后对翻译所做的一番比喻至今天读来仍然非常的亲切:

“翻译就是把窗户打开,让光线进入房间;翻译就是把贝壳撬开,这样我们便可以品尝里面的内核;翻译就是撩开窗帘,这样我们便能窥见最圣洁的地方;翻译就是打开井盖,这样我们便可获得水源”^③。

《圣经》译者这一串比喻的独特性在于,他们把翻译与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挂起了钩:光线、食物、水(对信奉基督的人们来说还要再加上上帝)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而通过翻译,人们就可能获得这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当然从这些比喻中我们还可进一步引申出这样一层含义:翻译还给了我们了解世界文学和文化的途径,翻译还让我们进入了世界别的地方、别的时代各种人的思想状态与境界,使我们的视野开阔,使我们自己的文化获得进一步丰富的养分。试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翻译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圣经》(或者说基督教)会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吗?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文豪的作品能传播得那么广吗?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没有翻译也就没有现代中国,因为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翻译。总之,如果没有翻译,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肯定还会处在一个相互孤立,蒙昧不化,缺少知识,艺术贫乏的状态之中。翻译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确实是巨大的。

① 见 Wechsler 1988. p. 10.

② 见 Bowker 1998. p. 52.

③ 见 Wechsler 1998. p. 11.

对翻译(者)众多的比喻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对翻译或者翻译者总体或者宏观的比喻;第二类比喻则侧重于对翻译(者)操作过程的描述想像。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类比喻的若干例子。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对翻译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

“一种语言在未被翻译之前就如同是一个处女,尚未与一个外国人同床共枕并生下混血儿。暂时来说,她还仍然保持着其纯洁与天真,展现的是其人民性格特征的真实形象。”^①

这个比喻似乎是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任何语言一经翻译,它原来的风格面貌必然受损,或者说必然会发生变异。属于原来语言的特有的色彩与韵味必然有所丧失。“混血儿”的比喻十分形象地道出了翻译作品与原作之间既有血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这样一种复杂而又独特的关系。说这两者之间有“血肉联系”,是因为翻译并非空穴来风,它是源于原作的。借用现代遗传科学的术语来解释,也就是翻译必然带有原作的遗传因子。说翻译作品是一种“混血儿”,是因为翻译的产生是原作与另一种语言文化结合的产物,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养料对这个“混血儿”能最后被分娩出来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比喻也许还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翻译与原作绝不可能完全划等号,后者只是长得很像前者。至于到底长得有多像,则要看译者的水平了。

德国最伟大的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对翻译家有这么一个比喻:

“翻译家应被看作是忙碌的媒人。他对一位还半遮着面的美人大加赞誉,说她真值得我们倾心。媒人就这样激起了我们对这位美人的爱慕,一定要对她本来的长相看个究

① 见 Robinson 1997. p. 208.

竟。”^①

这个比喻至少有三层含义。一、翻译工作就其性质而言是媒介性的,而好的翻译家对其从事的翻译工作都是全身心地投入的。二、无论翻译家如何努力,他让读者看到的内容与原作相比总是还存在距离的。“半遮着面的美人”这一说法非常传神。读翻译作品毕竟不同于读原作,多少总有点“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要完全领略“原汁原味”,当然最好还是去读原文。三、好的翻译不仅能成功介绍原作品,而且还能进一步激起读者对这位“半遮面美人”的强烈好奇心与爱欲,最终还会忍不住要去找原著读,以便毫无阻隔地去看清楚这位美人的全部容貌^②。

Susan Bassnett 与 Andre Lefevere 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的前言中把翻译比作婚姻:

“虽然从理想的角度来说,翻译可看成是两种不同的文字或文字背景之间的美满婚姻,使得两者和谐相处,同甘共苦,但是实际上翻译的进行是呈垂直轴线而非水平轴线的。换句话说,翻译者要么把译品提升至原文与原作者的水平,要么把目的语的文化看得更高,于是就完全让原作去适应它。这后一种情形在今天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当译者所处理的篇章距现在有相当大的时空距离时,情形更是如此。”^③

把翻译看成是两种文字与文化之间的婚姻是很恰当的。然而婚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总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还常常体现在婚姻的不平等上。依据这个比喻,这种不平等似乎是绝对的,因为译者有意无意中总会暴露出他在两种文字与文化中偏向甚至偏爱哪

① 见 Robinson 1997. p. 224.

②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所谈的体会。据他说,他就是因为看了林纾的西洋小说翻译,受到吸引,才去找原著读的。

③ 见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 1990. p. 11.

一方。对两种文字和文化始终“一碗水端平”的译作大约很难找到。为什么有的译作读来洋味十足(即所谓“洋化”),而有的译作读来全然没有翻译的痕迹(即所谓“归化”),有如浑然出自中国作者之手呢?部分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翻译者还被比喻成“像一位雕塑家,用雕塑再现油画作品的形象”^①。这个比喻强调的是真正的翻译者,其工作是具有创造性的。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特别是从一种文化过渡到另一种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重新制作的过程。这个比喻也很清楚地意味着翻译不可能靠逐字逐句地去对应去完成。雕塑家看着油画,重新创作一个体现同一主题的艺术品,恐怕首先要对这幅油画心领神会一番,在对整幅画的意韵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后,才能动手自己的创作。

在西方,翻译家数百年来也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把一个酒瓶里的酒倒到另一个酒瓶里去”^②。这个比喻简练形象地说明了翻译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首先,翻译者须把原作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翻出来(把酒全部倒出原来的酒瓶)。也就是说,原作所包含的一切(例如文笔犀利,行文幽默,语调激昂等等特点)都不能剩下、漏掉。其次,翻译者是用另一种语言形式(另一只酒瓶)在装酒。这只瓶子的式样可能与原来的酒瓶式样相差不大(也就是说语言的属系比较相近,如英语与德语之间),也可能式样相差很大(也就是说两种语言,或者说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存在极大的差异,如英语与汉语之间)。重要的是,原作的一切在新的酒瓶里都要装得下,要装得得体,使人一见这瓶新酒就想喝,而且要让人一喝就陶醉。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些对翻译的第二类比喻。欧洲学者格林

① 见 Wechsler 1998. p. 10.

② 见 Wechsler 1998. p. 10.

(Jakob Grimm, 1785—1863)把翻译比喻成渡河,因为在德语里,翻译与渡河这两个单词拼写完全是一样的。这个比喻用到翻译上之所以贴切,是因为渡河牵涉到的诸因素对翻译都具有意义:船是要翻译的文本,领航者是翻译者,渡河(渡海亦然)的航程便是翻译的过程,河(海)的两岸分别就是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①。这个比喻所涉及的面很广,几乎包括了翻译及翻译研究的主要方面:翻译的目的(为什么要渡河?),翻译项目的选择(什么船及什么货?),翻译者的资格(谁有能力领航?),翻译与文化(船运的货物对路吗?),翻译效果测定和翻译批评(彼岸的人对货物的满意与鉴赏程度如何?)等。将翻译比喻成一个渡河的过程,确使我们更加立体地领会到翻译包涵的诸多因素。

美国翻译家 Margaret Sayers Peden 推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翻译比喻:

“我喜欢把原作想像成一块方方正正的冰。翻译的过程就是这块冰溶化的过程。待到变成了液体状态时,每个分子都变换了位置,没有一个分子与其他的分子再保留着原来的关系。它们开始了在第二种语言里形成作品的过程。分子有逃逸掉的,新的分子涌了进来填补空缺,但是这种成形和修补的轨迹完全是隐性的。在第二语言里确立起来的译品是一块新的方方正正的冰块,它虽与原来的冰块不同,然而外表看上去却是一模一样的。”^②

这个比喻之所以新颖,是因为它借用了自然科学对物质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的描述,十分的生动,也颇富揭示性。一块冰从溶化到再结成冰,中间的过程其实是剧烈的,伤筋动骨的,然而却又是悄悄的。这个过程既是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的过

① 见 Schaffner 1995. p. 7.

② 见 Wechsler 1998. p. 11.

程,同时也是翻译者默默地创造性劳动的一个生动写照。“分子位置的变换”不就是象征着翻译操作时词、句位置与结构的重摆与重组吗?这种重新摆位置,重新调整结构的操作是贯穿翻译始终的。翻译完成后,译作又“复原”为一块冰,而且照样是那样方方正正的。换句话说,译品不能出现任何走样,任何破损和破绽。原文有多少魅力,译文也应当尽可能体现多少魅力。

对翻译,另一种最新的、也许是更具揭示性的一比喻是:“没有舞台的演出。”^① Wechsler 把翻译家与音乐家作了比较后认为,作为艺术家,翻译家与音乐家是同一性质的,他们都把别人的作品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再现给人们。然而,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首先,音乐家再现原作艺术时是有舞台的,而翻译家则没有舞台,观众(读者)看不到他的实际“表演”。其次,音乐家靠声音的传送或动作的展示来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而翻译家靠的是文字。再其次,一个音乐作品创作出来,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最终通过身体动作或喉音传达给大众。根据雅各布森(R. Jakobson)对翻译的界定,这也是翻译的一种^②。而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任何一本著作、一篇文章,一首诗)都不是为了要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而创作、而撰写的。此外,与音乐家相比,翻译家虽然似乎显得默默无闻,但所承担的责任与压力却更大。这是因为,每一位音乐家都知道,他的同一表演(也就是对某一音乐作品的具体翻译)会有几十次、几百次(一次表演有差错或不太理想,下次表演可以改正或者改进),而且他本人并不是惟一的表演者(翻译者),别的许多音乐家都会以各自的表演来展示这同一原作;但是对于翻译家来说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知道自己对一件作品的“表演”可能就只有一次,至少在他这一代人的岁月里是如此(一般来说,同一作品被人重复翻

① 见 Wechsler 1998. p. 7—8.

② 见 Rainer Schulte 1992. p. 7.

译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而且一旦自己的“表演”出现失误或不尽如人意,要想补救或重新再来是不可能的,因为翻译作品一经问世,基本就是一锤定音了。

巴西翻译家们对翻译有一个令人惊异的比喻。他们将翻译者描绘成一个“食人者”(或者说是“吞食同类者”cannibal)的形象。就是说,如同在一个祭祀仪式上食人一样,翻译者将原文吞将下去,然后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东西来^①。这个比喻实际包含了一种对翻译看法的观念性变化。从传统上来说,翻译中原文与目的文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原作与译者之间的关系,总是支配与服从,主与仆的关系。这种主仆关系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翻译者(更确切地说是译入语文化)处于主人地位。这时翻译者在翻译时对原作要进行“改善”,使之“开化”。第二种形式是翻译者尊崇原作,态度十分恭敬,想方设法顺着原文。现在这个新的比喻是对这种“主仆关系”的更正,从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翻译,其实质是强调翻译本身具有原创性。用 Jacques Derrida 的话来说就是“翻译的过程又创造了另一‘原作’”^②。这样一来,译作与原作便处在同一地位上,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即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原著者与翻译者同是原创者,是在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原创者。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谈到翻译时用了一连串的比喻:

“许多翻译都是在一种方案与另一种方案之间的妥协。翻译是一种变戏法的动作,是一种碰运气的事,是走钢丝。无论对译者、对读者或者对翻译批评者而言,只要有点时间,他们总会将对已翻译的东西改变主意或看法。”^③

① 见 Susan Bassnett-Mcguire 1991. xiv.

② 见 Susan Bassnett-Mcguire 1991. xv.

③ 见 Newmark 1993. p.2.